

临桂文史

第十二辑



政协广西临桂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临桂文史

第十二辑

主 编 刘云松

副主编 石复兴

编 辑 诸葛明高 董临青
张俊

政协广西临桂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目 录

史海钩沉	
周总理桂林寻友记	
——吴祥初忆总理夫妇对姨母郑季清的关怀	龙丽芬(1)
被埋没了半个世纪的功臣	
——追访临桂革命老人蒙政智生前事	龙丽芬 黄凌艳 莫耘(4)
活着的“烈士”——刘伟才	张俊 莫天明(8)
张国焘头陂之行	刘汉业(12)
人物春秋	
李崇仕的军旅生涯	李志安 刘波(17)
秦强及“秦强事件”	李志安 刘元(21)
著名作家李海鸣	刘波(23)
回族高级工程师彭懋华	刘波 刘宗惠(25)

名人轶事

李宗仁离别人间的遗嘱	李绳规(27)
蒋介石为白崇禧母亲做寿	
白伍嫂口述	李次华整理(31)
李宗仁关心家乡建设二三事	卢嵩(32)
郭德洁聘白葆生为古文老师	常启明(34)
白崇禧一次有关抗日的演讲	刘宗惠 刘波(36)

白崇禧与其外甥海竞强事略	常启明(39)
廖志远生平轶事	伍辉映(42)
白先勇小说《谪仙记》投拍前后	刘波(47)
肖明祥在五通中学	朱名顺(49)
彩调艺人李银孙	李志安 刘元(52)
茶洞有个黄喜得	廖延晖(56)

文史纪实

王河天烈士墓修复前后	梁仲华(58)
------------	---------

往事回忆

李鹏总理两次来临桂	陈齐瑞(61)
我记忆中的秦丰林	周裕屏口述 甘广秋整理(63)
在南京拜见白崇禧先生	吴君平(67)
解放军在六塘演出第一场戏追记	常启明(69)
扫盲夜校	常启明(71)
对土改复查工作队与农民三同的感受	秦春(72)
抗日战歌震临桂	

——桂林文抗队在秧塘的四场演出

游击队神枪毙日寇 梁龙嫂智勇脱险情	廖延晖(77)
枪毙汉奸韦三单	谢德裕(80)
美国战斗机在两江殉难见闻	陈齐瑞(82)
到两江谋生的艺人不给日本鬼子唱戏	
小金凤在两江	刘波 刘宗惠(84)
	刘宗惠 刘波(86)

千万不能忘记

- 日本鬼子洗劫龙曲村 姚一初 廖延晖(88)
日本鬼子在税江村犯下的滔天罪行 李次华(91)
日寇掳掠陂角村 刘宗惠(94)
五通一次春渡大惨案 张德健(96)
乐于捐资修桥的张崇界 张玉喜(100)

史海拾贝

- “临桂”号飞机 谢德裕(101)
临桂第一个农业初级合作社 谢德裕(103)
回忆两江人民公社成立 梁 丰(105)
临桂土改的艰苦历程 刘汉业(107)
临桂农业税征收政策制度的演变简史 伍辉映(113)
六塘镇解放前教育事业概况 李志安(116)
历史悠久的文昌小学 朱名顺(120)
义宁县高等小学纪事 刘 波(123)
六塘女子学校始末 刘 波 李志安(125)
义宁县地方行政干部学校掠影
..... 刘 波 彭茂章(127)
山口小学今昔 卢 华(129)
七十年代的高妙“五七”中学 陈齐瑞(133)
临桂的第一座水电站 谢德裕(136)
五通第一个碾米厂 张玉喜(137)
六塘镇第一台收音机和六塘清小的一只喇叭
..... 常启明(138)
五级制记分法 常启明(139)

我县最后一次阶级成份登记	秦 春(141)
中央歌舞团演员到瑶山体验生活	秦 春(142)
五通的十八座	张玉喜(143)

地 方 风 物

临桂乡镇人近代穿着、发型的演变概况	刘汉业(145)
临桂民间有五种狮子的乐舞艺术	秦 春(151)
临桂曾经盛行的高雅文场曲调	秦 春(153)
六塘镇的文场戏	何红玉 苏兆斌(155)
龙船歌及其由来	秦 春(158)
义江两岸农村流行请剧团唱彩调贺喜	秦 春(167)

民 族 风 情

庙坪禁风节轶事	石芳润(168)
我县瑶族有 30 种乐舞	秦 春(171)

名 胜 古 迹

临桂山水的奇趣景观	秦 春(177)
县域明代曾有两座王城对垒	秦 春(180)

文 史 随 笔

清塘村兴修水利话今昔	王应坤(182)
临桂南边山生态今昔	刘汉业(186)
临桂有多种耕作习俗	秦 春(189)
寿星看世界	谢德裕(191)

历史悬案

- 太平军财宝是否埋在五通长塘底 谢德裕(193)
九千鸦片藏何处 谢德裕(197)
两江古城辨 谢德裕(201)
封面照片:临桂县黄沙九洞岩瀑布

周总理桂林寻友记

——吴祥初忆总理夫妇对姨母郑季清的关怀

龙丽芬

1960年5月，周总理从国外归来，就接到邓颖超从桂林打来的电话：“你要找的老朋友，我已经替你找到了。”这位老朋友是谁？她在哪里？总理百年诞辰之际，笔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周总理的老朋友郑季清的外甥女吴祥初。郑季清已去世。吴祥初的母亲郑婉清和郑季清是亲姐妹。郑季清没有子女，便和姐姐住在一起。八十多岁的吴祥初现住象鼻山附近。她激动地拿出郑季清1920年8月10日在天津觉悟社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合影，以及邓颖超给郑季清、吴祥初的亲笔信。讲述了周恩来夫妇与姨母的一段友情。

郑季清和邓颖超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是同班同学，两人亲如姐妹。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京学生发动示威游行，天津各校学生大受震动，纷纷组织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女子学校学生为主的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邓颖超担任女队宣传队队长。爱国运动如燎原烈火，周恩来从日本弃学回国，参加革命，他白天投身于火热的斗争，晚上写稿主编《天津联合会报》。1919年9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妇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领导骨干，共20人，成立了“觉悟社”，大家选举周恩来为主席。郑季清是“觉悟社”的成员，协助周恩来、邓颖超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郑季清是童养媳，因反抗封建婚姻，与丈夫离了婚，后来由于环境所迫，颠沛流离，最后栖止桂林，与吴祥初一家住在一起。郑季清在临桂县花岭小学任

教。

解放后，周恩来一直在寻找郑季清。一次出国访问，途经云南西双版纳自治州，见到了任西双版纳自治州宣传部长、吴祥初的妹妹吴祥祉，得知郑季清在桂林，便先派邓颖超来桂林找。周恩来到桂林本来是不准备去看七星岩的，但他又怕自己不去，随同来的同志也不好去。这时，邓颖超建议说：同志们第一次来桂林，先去看看七星岩，我和总理就不去了。我们还要会见一位老朋友。总理马上笑着说：我同意。即派邓颖超专程去接郑季清。

邓颖超笑容满面，手拎着一小筐金黄色的枇杷，走到了吴祥初家。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她与郑季清拥抱，见郑季清因中风手不能抬，头发有些零乱，就用梳子边细心地为老同学梳理着头发，一边和蔼地说：“季清姐，翔宇（周恩来的号）到了桂林，他让我接你到榕湖饭店与他见面。”

郑季清到榕湖饭店一见到总理，眼含泪花，激动地高呼：革命成功了！革命胜利了！……总理满脸笑容地请她坐下，亲切地询问：您怎么不给我们写信？现在住在哪里？身体好不好？郑季清说：“我知道你们忙于国家大事，忙于世界大事，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党和政府对我照顾很好。”总理还和郑季清一起回忆一些牺牲了的革命先烈，心情都很激动。当总理知道郑季清身体不好时，就拿出一笔款来，对她说：这是我们的薪金，你收下治病吧。郑季清热泪盈眶，一再推辞，但总理还是坚持要她收下了。邓颖超还送了一件银灰色的毛衣给郑季清。

总理回京后，派人到桂林来，要接郑季清到北京治疗，来人还带来了邓颖超给郑季清的亲笔信。信上是这样写的：“……回京后得知近来医疗革新，对瘫痪病采取综合快速治疗，疗效迅速显著，我们特托人协助你，接你到北京入院治疗，

以苏你久病之苦,而痊愈后又能更多的为人民服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此举想能得你的同意。愿你万勿客气和有所顾虑,毅然整装起程,是所至盼……”吴祥初说,词意恳切真诚,关怀爱护,感人至深。郑季清在北京治病期间,邓颖超不仅多次去医院看望,还给吴祥初写了两封信,告诉郑季清的病情,并问候吴祥初母亲的健康情况。这种深情厚谊,使吴祥初一家终生难忘。

郑季清在桂林病故后,周总理、邓颖超给桂林市委统战部拍来了电报,委托有关部门妥善料理好老人的后事。邓颖超还给吴祥初写来了慰问信,慰勉吴祥初“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工作,坚持人民教师光荣岗位,这是对你姨母最好的纪念……”17岁就当老师的吴祥初和老伴牢记邓大姐的话,一直没离开过教师岗位。

吴祥初老人说,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还记挂一个病残老友,这种深情厚谊,时时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图为 1920 年 8 月 10 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天津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前右三为邓颖超,前左三为郑季清。

被埋没了半个世纪的功臣

——追访临桂革命老人蒙政智生前事

龙丽芬 黄凌艳 莫耘

青山伴随着潺潺流水，老人静静地躺在亲手开辟的果园旁。在这里，他每天都看着乡亲们在那一块块希望的田野上辛勤耕耘。在这里，他每天都可以看见他居住了40多年的老屋。1998年的夏天，87岁的他知道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就拿出一个盒子，里面装有500元，他对身边的子女说：“这是我仅有的一点钱，就留给你们的母亲以后办后事用吧。我死后，你们要带好自己的子女，各人干好各人的工作，靠自己的双手吃饭。”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当笔者到达位于临桂茶洞乡江洲村时，只见人去房空，老人的房门贴着一副对联：想见音容万里云，思听教训月三更。这是后辈们对他的怀念。

这位老人叫蒙政智。在大山里放牛、砍柴，读过两年小学。当他肩负着全家生活重任的时候，1940年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当壮丁，参加了山东莱芜的抗日战争。1947年5月1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陈毅同志领导的部队当战士。1949年7月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在解放军部队里，蒙政智参加过大小战役共17次之多，其中包括“淮海战役”、“济南战役”、“山东纬县解放战役”、“张江棚战役”、“百万雄师渡江战役”、解放大上海战役，参加了部队在山东、江苏、浙江一带开

展的游击战争，先后负伤七次，身上留下许多伤痕。他在部队历任班长、排长，立功六次。他被授予“二等人民功臣”。现在，老人留给亲人的最富有的财产就是用红布包着的参加各种重大战役的纪念章、军功章、功劳证。1953年，蒙政智被选送到浙江军区干部管理学校学习。在学校，他荣立三等功。1954年12月，41岁的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领取了国防部批准颁发的“转业军人”证书，1955年元月，蒙政智回到了临桂老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江洲小乡。

梁桥桂老人至今清楚地记得，穿一身军装的蒙政智胸前挂满奖章，由部队的同志敲锣打鼓送到村里。他任乡财粮管理员，没有半点怨言，从来不提自己在部队的事。只是在民兵训练时，有人怕苦怕累，他教育大家要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用部队的光荣传统训练队伍。人们只是从这里，才知道他当过兵。

1958年，他担任党支部书记时，经常关心群众生活。在国家困难时期，村里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分得的浮肿饼不够吃。他到梁桥桂家里，见梁的老父亲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就把自己分得的浮肿饼分了一些给老人。老人吃了浮肿饼，病情减轻了许多。后来，他又把家里剩下的浮肿饼全分给了乡亲们。大家称这是“救命粮”。村民病好了，而他自己却患上了浮肿病。

他经常教育党员要为国家着想，处处带头。平生他最恨赌钱，而一些赌徒们赌瘾很重，危害极大，他和大家一道狠抓赌风，刹住了歪风邪气。他时常告诫“一班人”，要选好全心全意为群众办事的干部苗子。他培养出来的干部，以后成了村

里“顶梁柱”。他培养入党的梁桥桂，后来成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逝世时，村里的党员都自发地去吊唁他，缅怀他们的老支书。

有一年，昔日的老部下专程从上海来看望他，已是师长的老部下仍然叫蒙政智“首长”。他是来劝伤痕累累的蒙政智进城工作的。蒙政智愿与青山作伴，他离不开乡亲们。后来，在北京、上海当大官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写信来问他是否带全家到上海或北京工作，他干脆连信都不回。他从来不对任何人说自己的战功史。

40多年来，由于工作疏忽，民政部门一直把他的转业军人待遇当成是一般的复员军人处置，他从来不去争。江洲老一辈的人知道他打过许多仗，但不知道他成功累累。曾经有个老师到他家请他到学校讲“打仗故事”，他说他没有打过仗。当他43岁成家的时候，纯朴的姑娘还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农民。80年代初，离退伍军人待遇提高。一些知情的人劝他到县里诉说“光荣史”，把“复员”改为“转业离休”，他一笑了之。现年42岁的大女儿至今也还不清楚父亲那一段光荣的历程。年过花甲的蒙政智后来担任了茶洞供销社收购组罗汉果收购员，65岁时才退休回家。

蒙政智家庭生活拮据，他终年劳累，积劳成疾，旧伤复发。50出头就落下了耳聋和哮喘病，他看病、住院从未得过报销。他教育子女要严格要求自己，多学点东西。他种罗汉果卖得的钱供7个子女上学，就是借钱也要让子女们上学。70年代末，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子送到部队锻炼。家里其他几个子女都还小，他自己担起了生活的全部重担。

小女儿在乡中学代课多年，所教班级年年成绩优秀，每月

只得 90 元代课金，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她听人说非农业人口可以搞“以工代教”，便贷款 3000 元买了城镇户口，却分不到指标。女儿向他诉苦，求他帮到有关部门说说情。蒙政智难为情地对女儿说：“过去我负伤、流血、立功，是过去的事，现在我怎么好开口向政府提这样的要求呢？”他劝女儿别教书了，干别的总要强些。女儿说：“我丢不下教师这个职业，更丢不下孩子们，苦就苦点吧？”。蒙政智落泪了，小女儿也流泪了。

老人生前，一些人稍稍了解一点他的历史，于是，他们便向组织部门反映。1996 年 4 月 15 日，市委组织部下文，把蒙政智那一段光荣的历史公布于众，并每月发给他生活困难补助 120 元。他不愿去领。大儿子帮他领回钱，他说：“当年的战友们牺牲在战场上，他们把生命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参加革命几十年，没有向党和人民提过任何要求，现在领这个钱真不好意思，真不应该给国家提这个要求。更何况现在子女们都长大成人了。”

年过八旬的蒙政智闲不住，他自己在离家有三四里路的山边开了一个果子园，种下了近 300 株柑子树。每天日出日落，老人精心地护理着果园。他说他死后就埋在这里，果然如愿。茶洞乡最早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蒙政智，每天看着那充满着希望的田野，他那终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宿愿，正在变成一幅幅美丽的蓝图……

活着的“烈士”——刘伟才

张俊 莫天明

1926年12月，刘伟才出生在临桂县秧塘乡（现属庙岭镇）独峰上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不到10岁父母就双亡，不久二哥病死，兄弟4人和60多岁的老祖母相依为命，全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跑日本鬼”时，祖母被凶残的日本鬼杀害，其状惨不忍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打内战到处征兵抓壮丁，大哥为躲征兵被迫离家出走，流落他乡。三哥被好心人家接去做仔，剩下刘伟才和小弟两人孤苦伶丁。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给刘伟才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1949年10月中旬桂林解放，刘伟才怀着对旧社会无比憎恨的心情和立志报国的愿望，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第49军。刘伟才参军后担任连队的机枪射手，在广西的寿城、三皇、泗顶、板榄一带山区剿匪。先后参加剿匪战斗20余次，为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烧到我国的鸭绿江边。在这紧要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刘伟才和他的战友们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纷纷写决心书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鲜去，用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1年1月3日，刘伟才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

朝作战，被编入第38军某团3营9连3排7班。入朝后，刘伟才积极投入紧张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挖坑道、修战壕，写决心书、请战书，苦练杀敌本领，做好战前的多项准备工作，随时准备同敌人决战。1952年5月的一天，刘伟才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参加第五次战役攻打上甘岭的战斗。部队领导进行战前动员，战士们得知参加攻打上甘岭的战斗，群情激奋，同仇敌忾，决心与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当天下午5时，部队全部轻装上阵。天刚黑，部队立即发起总攻。刘伟才扛着爆破筒和所在的战斗小组共4人，在副班长的率领下，冲在全团的最前面。他们冒着敌人暴风雨般的炮火封锁，冲过了两里多路的开阔地带，紧接着连续冲上了4个山头。正当刘伟才他们继续向高地进攻时，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落在了他们的身边，刘伟才只听到一声巨响后就昏迷过去了，后续部队继续向高地冲去。当刘伟才慢慢苏醒过来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他艰难地抬起头，借着周围枪弹爆炸的亮光看到副班长、组长和另一位战友已牺牲，自己也身负重伤，左脚子骨被炸断，右大腿3处负伤，浑身是血，无法包扎。朝鲜的5月，山头还有积雪，天寒地冻。刘伟才双脚4处负伤，流血过多，口干舌燥，全身冷得发抖，下半身无法动弹。为了不拖累部队和避开敌人炮弹的轰炸，刘伟才以顽强的毅力，咬紧牙关，忍住伤痛，从一个炮弹坑滚到另一个炮弹坑，并利用山坡的地势，慢慢地滚下了4个山坡，到达开阔的地带时，已不能再滚，刘伟才只好用双手艰难地爬行。两里多路的开阔地带如同万里长城，刘伟才到底爬行了多长时间，其间昏迷失了多少次，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了。当刘伟才异常艰难地爬出开阔地带接近自己的阵地时，天已朦朦胧亮。这时，遇上两位朝鲜老大爷抬着单架向他走

来。两位朝鲜老大爷将刘伟才抬上单架，沿着战壕，冒着敌机的一次次扫射，送往志愿军战地医院抢救。由于伤势较重，在战地医院开刀后立即转送到黑龙江一面坡志愿军陆军医院住院治疗，3个多月后又转到北京石家庄医院治疗。经过半年多的住院治疗，刘伟才伤愈出院。由于左脚伤残，无法重返前线。于1953年4月复员回到自己的家乡。

刘伟才复员后，回到县民政科报到。当时负责接待他的是县民政科干部梁承光，他一边看介绍信，一边盯着刘伟才问：“你不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吗？烈属证明书都寄到你家里去了，原来你还活着。”刘伟才说：“我在朝鲜战场上负了重伤，经过住院治疗已好了，没有死。”为什么人还活着，却成了烈士呢？据刘伟才回忆，当他负重伤醒来后，忍痛从山头上滚了下去，这时我们的部队已夺取了上甘岭。战斗结束后，部队在打扫战场时，由于牺牲的战友血肉模糊，辨认不清，无法找到刘伟才，以为他牺牲了。而刘伟才负重伤住院又转了几个医院，无法和所在部队取得联系。因而所在部队将“烈属证明书”寄到了刘伟才的家，刘伟才成了活着的“烈士”。

刘伟才复员回到家乡，三个月后，左脚伤痛发作，伤口灌浓，乡亲们送他到桂林专区医院开刀治疗。住院近半年伤愈出院，组织上安排他到四塘粮所工作。不久，粮所领导派他到二塘粮食收购点修建粮仓，为组建二塘粮所做前期准备工作。由于刘伟才工作出色，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任二塘粮所副所长，1965年调两江粮所任副所长，1969年从两江调回二塘粮所任副所长，后兼任二塘大米加工厂副厂长主持工作，直到1980年10月光荣退休。

刘伟才在我县粮食系统一干就是20多年，在这20多年